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ZHEN JIANG LIBRARY

2009年11月15日

本期导读

- ☆让“政府感谢人民”成为常态
- ☆民生关怀期待“提前介入”
- ☆请事先听听公众意见
- ☆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
- ☆官员不能这样“爱”文化
- ☆广州首次网上“晒”政府预算
- ☆句容：“会员制农业”破土萌芽
- ☆杭州，“天堂”重返自行车时代

阅读镇江

镇江名人（三十三）

才秀人微的诗人——鲍照（约415—470），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本籍东海（一说上党），少居京口。家世寒微，文辞赡逸。宋文帝元嘉中，河济俱清，为《河清赋》。尝谒临川王刘义庆，未见知，乃献诗言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擢为国侍郎。元嘉二十一年王薨，照失职。复为始兴王刘浚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孝武帝好文章，自谓人莫能及，照为文乃多鄙累语，时人以为才尽。后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临海王子顼镇荆州，掌知内命，迁前军刑狱参军事。明帝自立，子顼反，军败，照为乱军所杀。有集十卷，内诗四卷。

鲍照的诗存约二百首，半为乐府，而乐府中半为七言。七言乐府是他成就最突出的作品，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七言诗酝酿时期的唯一大作家，在七言诗的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拟行路难十八首》是此类作品的代表。他通过诗歌表达了自己出身寒庶、仕途艰难，虽身怀抱负而不能施展的苦闷：“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又有壮志难酬之后的愤激感慨或故作旷达：“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对唐代李白的创作有着极深的影响，杜甫谓之“俊逸鲍参军”。

他还创作了一些军旅题材的诗歌，表现了诗人对于战争的复杂心情——既怀有对于统一的渴望，同时又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感到悲悼：丰富了边塞诗的内涵。《代出自蓟北门行》有慷慨激昂之气：“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疾风冲塞起，沙砾自疆场。……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建除诗》则有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收功在一时，历世荷余光。开壤袭朱紱，左右佩金章。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而同时又有士兵之苦：“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思妇之愁：“执袂分别已三载，迩来寂淹无分音。朝悲惨惨遂成滴，暮思遑遑最伤心。”

后人认为，元嘉诗人以“颜谢”并称，实则颜不及谢，而鲍不但与谢并峙，甚至有凌驾其上之势。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句容：“会员制农业”破土萌芽

稻米刚刚收割完毕，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党总支书记李家斌的手机就响个不停。几天时间里，6万公斤大米被电话订走，“所有打电话来的客户，都是我们的会员。”记者了解到，在日本等国家风行的“会员制农业”，如今在整个句容已破土萌芽，迅速成长。

引入这一全新农产品销售机制的是著名农技专家赵亚夫。据介绍，到目前为止，“句容有机农业朋友会”已拥有500多名会员，客户只要在表格上填写联系方式和需求数量后便可入会。会员多半是南京和镇江地区的学校教师、企业白领。会员购买有机大米和果蔬，享受九折优惠，免费送货上门。赵亚夫说，农产品进超市或大卖场，中间环节比较多，而且进入的资金门槛也比较高，一般农户和农业合作组织难以做到。“会员制农业”则是点对点的销售，农民和消费者都得到了实惠。李书记说：“现在，这一模式在句容发展非常迅速，我们的目标是年底前在镇江发展到1000户，在南京发展到1万户。”

句容市华阳镇的华甸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也在推行“会员制农业”。这家专业合作社拥有3500多亩高档蔬菜种植基地。合作社有专业网站，通过在网上发布信息，仅南京一家金融机构就有200多人成为会员。

——摘自《新华日报》

“人才强市”战略推进

日前，镇江市政协举行六届21次主席会议，专题听取该市“人才强市”战略实施的情况通报。

去年以来，镇江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创业创新领军人才为重点，加快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在人才总量显著增加的同时，人才素质也得到不断提高，人才结构进一步改善，人才环境明显优化。目前，全市人才总量为29.58万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6239人、本科学历66205人；高级职称以上7838人。全市人才总量占人口比例、本科以上人才比例、高级人才比例均居全省第五位。

镇江市政协主席郭礼荣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该市“人才强市”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建议该市组织人事部门抓好党政、科技、高技能人才三支队伍建设，在用好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加快引进紧缺人才，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并继续优化全市人才环境。

——摘自《江南时报网》

镇江市民将有望用上“电子钱包”

镇江人的电子钱包即将面世，近日，记者从镇江城市通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我市从2008年开始筹办城市一卡通，并在今年8月份获得由国家住建部颁发的密钥，日前，我市大众出租车公司在所有出租车上已经安装了刷卡设备，并即将进入测试阶段。也就是说，镇江通可用来打车（出租车刷卡），今后将会普及到全市的公共交通。

据了解，城市一卡通，主要用于公交、出租、地铁等交通领域，今后还能与周边城市乃至全国城市间互联互通，这不仅仅方便了使用，还促进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另外，一卡通还会迅速向园林、高速公路收费、小额消费等领域拓展，成为市民名副其实的电子钱包。

据工作人员介绍，“镇江通”是一种多功能IC卡，它不仅可以在出租车、公交、地铁、加油站等公共交通领域使用，也可用于各单位门禁和上班考勤，还可以进行水费、电费、天然气费、话费等公共事业缴费，不久的将来还可用于超市、商场、影院、书店、酒店、西餐店、健身娱乐、旅游景点等行业进行小额消费且可以打折，可以说是既省钱又方便。

据了解，“镇江通”采用的是一种非接触CPU卡，这是目前最先进的IC卡。它将一个集成电路芯片镶嵌于塑料基片中，封装成卡的形式，外形与磁卡相似。卡内集成电路中包括中央处理器(CPU)、只读存储器(ROM)、随机存取存储器(RA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以及片内操作系统COS等主要部分，犹如一台超小型电脑。具有信息量大、防伪安全性高、可脱机作业、可多功能开发等优点。

——摘自《名城镇江网》

焦点关注

让“政府感谢人民”成为常态

北京市委市政府于10月2日发出的一封《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引起舆论界高度关注。这是因为，其中寓含的意义十分重要而深刻，值得我们好好解读。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见过这样那样的致谢，却很少见到官方、政府向市民致谢。在一些人那里，官方、政府是领导你的，指挥你的，派遣你的，你平民就只有听指挥和照着做的份儿，这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秩序”的味道，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相反，官方、政府帮

了人民、群众，后者是要倾心致谢的。很有意味的是，我们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尽管你打的关键词是“政府感谢人民”，而搜索出的结果，却是“人民感谢政府”的条目占绝对数量。

“人民感谢政府”司空见惯，而“政府感谢人民”相对极少，的确值得深思。多少年来，总是人民发自内心地去感谢官方，这只要从官方这部门那单位荣誉室里的感谢信、锦旗、谢匾之多，就可一目了然。但“政府感谢人民”的事例，就成了“凤毛麟角”，偶有一件，就会成为新闻……这种情形，是到了亟须改变的时候了。

如今之计，当务之计，是要将“政府感谢人民”纳入制度性安排之中。事实上，已有不少先例。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安排，让“感谢人民”成为常态。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感谢变成内在性的安排。换言之，这种感谢，应是内在的，自动自发的，出自内心的，不是搞“形象工程”。人民群众做得好，政府就应致谢。心心相印才能息息相通，和谐社会才能到来。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给政府公祭立个规矩

近日，某地公祭舜帝大典隆重举行，这是 2005 年以来该地举办的第二次祭舜活动。

尽管社会舆论对政府举办公祭活动早就提出过批评，但近年来，各地公祭之风却愈加兴盛。举办公祭的地方越来越多，规格越来越高；而公祭对象也从黄帝、炎帝、尧、舜、禹到女娲、伏羲、神农再到孔子、老子、诸葛亮、武则天、司马迁甚至柳下惠。如果公祭尧、舜、禹是正当的，那么就很难说公祭伏羲、神农不应该；如果公祭伏羲、神农是应该的，那么公祭诸葛亮、武则天就未尝不可，继而出现公祭柳下惠这等怪事也就不足为奇。哪位祖先或历史名人可以被公祭，一无标准，二无规定，花公家的钱没人心疼也没人管，中国人的祖先多，中国的历史名人多，公祭之风焉能不兴盛？

我们不反对民间人士祭奠先祖，也无权批评一些人对历史名人顶礼膜拜，但政府花钱举办公祭活动似有不妥。农民逢年过节烧香祭祖，被斥为封建迷信活动，而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却在公祭活动中，“匍匐在始祖归葬的这方圣土上，燃上一炷香”，这又成何体统？弘扬传统是应该的，但是不是非得采取烧香磕头的方式？缅怀先祖是可以的，但是不是非得花公款举办隆重大典！？

政府公祭之风盛行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还会助长一些地方官员华而不实的作秀风气，该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给政府公祭立个规矩了。

——摘自《人民日报》

“双胞胎政绩”给社会留下笑柄

日前，一名为“民风”的网友举报，称河南两个乡镇，在各自的政府网站上，挂出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政绩报道。两个乡，不仅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一致，就连种植的树苗也完全一样。这个“双胞胎政绩”报道让网友很纳闷。

该帖的下面，附有两家政府网站的原帖。一个是桐柏网，一个是睢县人民政府网。桐柏网上稿子的标题是：程湾乡林业生态建设突出三个特色，内容为程湾乡地处睢县最南部，辖 25 个行政村，58 个自然村，总人口 3.6 万人，耕地面积 4.1 万亩。睢县人民政府网上稿子的标题是：睢县平岗镇林业生态建设突出三个特色。内容为，平岗镇地处睢县最南部，辖 25 个行政村，58 个自然村，总人口 3.6 万人，耕地面积 4.1 万亩。

《法制晚报》10月27日刊登徐林林的文章说，今年初，“中国消防在线”网站上，河南开封消防支队与漯河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如出一辙，被网友戏称为“开封领导漯河指导工作”。眼下又发生“双胞胎政绩”这样的笑话，这不禁让人质问，一些地方政府的网站是怎么了？为什么充斥这么多虚假的东西？

——摘自《报刊文摘》

民生关怀期待“提前介入”

多些“事前救助” 少些“事后补助”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和石嘴山市平罗县近日一改以往“先看病后报销”的医疗救助模式，规定五保户可不缴费直接住院，受到老百姓的普遍称赞和欢迎。

当前，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不少对困难群体倾斜关照的惠民政策，然而大部分实行的是事后补助制度。

吴忠市利通区和石嘴山市平罗县实行提前介入的医疗救助政策后，大大缓解了特困农民看病难问题。不少群众反映，现在有了病都能及时到医院治疗，不再“小病扛，大病熬”。

现实生活中需要提前介入的民生关怀又岂止是医疗救助？在一些城市，低保户取暖费、自来水费、煤气补贴等都需要缴费后凭发票、凭收据办理，本应按月发放的低保金按季度发放。事情虽小，却关乎百姓生活，是民生热点和难点，如果能在工作程序、财务手续上稍稍调整，就能大大缓解群众的困难，提高惠民效果。

诚然，民生关怀提前介入可能增加了政府部门的工作难度，给财务结算等方面增添麻烦。但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给百姓生活带来了方便，能帮助群众得实惠，辛苦一点又何妨？

时下寒冬来临，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减免取暖费、送温暖等民生关怀政策，期待这些关怀能多些“事前”少些“事后”，期待民生关怀能在更多城市、更多领域提前介入，能从细处入手，多些人性化考虑，最终惠及更多群众。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请事先听听公众意见

日前，由于群众的抵制，投资3亿多元的江苏省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点火试运行之际，被当地政府紧急叫停。吴江市政府承诺，将在充分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当地群众的意见后，再定是否投产运营。面对项目被叫停，投资方负责人表示，企业的底线是投资由政府全部埋单。

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有毒物污染。在群众的抵制下，当地政府果断叫停即将试运行的发电项目，并作出充分征求公众意见的承诺，值得肯定。然而，这迟到的理性和正义无法挥去我们心头的沉重——如果发电厂最终下马，3亿多元的投资成本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倘若由政府埋单，则意味着公众将以纳税人的角色扮演另一场博弈的“输家”。

在事关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中，作为利益相关方，广大百姓的失声，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因此，尽管吴江垃圾发电厂一切程序合法，但仍不能令公众信服和满意。吴江市政府的承诺固然可嘉，但这样的事后征求意见，即便再公开再充分，已然无法改变某些既定事实。与亡羊补牢相比，政府更应该事先多听听公众意见，在项目论证阶段即邀请群众代表提前介入，在第一时间参与到这场博弈中来。唯有政府开诚布公，开门纳谏，公众积极参与，畅所欲言，形成各利益方公开博弈的良性互动，我们的社会才会更顺畅地向前发展。

——摘自《工人日报》

制度与违建较量的范本

武汉一栋在建高楼这几天遭遇强拆，原因是，审批只有 12 层，却违规建至 20 层。此乃当下制度较量的一个生动范本。

通常情况下，除非制度维护者想“权力寻租”，矛盾常常是由破坏制度一方挑起的。觉得制度成了实现自己利益的障碍，于是便想招来突破它，也便有了第一回合的较量：找关系，跑门路。这栋楼的主人是该省供销仓储运输总公司，曾“为增加面积奔走”，还曾“向江岸区分局递交过增加 5000 平方米的申请”被拒绝。

关系、门路不通，便有了第二回合的较量：规避制度。行违规之实，却期待制度维护者反应迟钝，或网开一面，或通融默许。在此案中，令违建者遗憾的是，在“施工方扎 13 层楼的钢筋时”就被规划局方面发现了，“当即要求对方整改”。不听，在申请强拆期间，还“从 16 层盖到了 20 层”。其间，“对其断水断电，仍阻挡不住”。

制度的破坏者和维护者都有最后的底线，这便是第三回合的较量：计算成本。对于破坏者来说，他们造成违规既成事实，再期待维护者在维护制度成本与社会财富浪费之间作出权衡，被告以“下不为例”了事，或被课以罚金，因小于违规成本而暗喜。这家公司负责人说：“做好了罚款准备”“我们违法了认罚，多少钱我们都付。但希望不要拆除，以免浪费资源”。规划局方面则表示：从价值上讲，拆除是会损失 500 万元，但若不拆，也就是法律失效，将来大家都来“赌”，今后城市的损失会更大。

在这次双方的较量中，当地规划局终于守住了底线。设若他们事先被“公关”，事中默许，事后一罚了之，制度就会被轻易击破，制度的权威性也就荡然无存。

——摘自《京华时报》

“有偿家教”堵疏皆要有度

在山东省立法禁止有偿家教后仅三天，浙江省就拟定了相反的立法朝向。有偿家教从一刀切禁令到有条件放开，浙江和山东算是唱上了对台戏，而浙江省的“大反调”无疑再次将在校教师有偿家教话题”推向了风口浪尖，在教育界、学生和家长中引发了强烈争议。

从目前教育体现出的特点来看，有偿家教宜疏不宜堵，但究竟该疏到何种程度，这不仅考验着立法智慧，同时也将具有风向意义。因为有偿家教不仅是教师趋之若鹜的捞外快手段，更是家

长们积极响应的课外补习方式。所以说两厢情愿的结合如果硬要通过规定来强制拆散的话，其结果必然招致双方的抵制和反对。教师有偿家教搞兼职，而家长又乐此不疲积极响应，纯粹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要双方有需求关系，有偿家教就不可能失去市场，教师们完全可以把曾经光明正大的家教方式从地上转为地下，换个马甲重新再来，而家长同样可以暗渡陈仓。

有偿家教的出现，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应试教育带来的不良竞争，另一方面也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在以成绩论英雄的应试教育环境下，有些条件相对差点的家庭为了不让孩子落于下风，就不得不通过课外补习手段来弥补教育资源上的不均等，而条件好点的家庭则更重视课外教育，既舍得投资也愿意让孩子进补习班。如今社会，不管是家庭条件好的还是差的，在对待孩子教育上思想都高度一致，没有哪个家长敢拿孩子的未来做试验。而教育上不甘人后的从众心理，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家长之间的相互攀比，从而给“有偿家教”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换言之，只要家长对孩子的高期望值不变，即使没有在职教师提供有偿家教，同样也会有其它人员跳出来提供，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

实际上，教师课外之余搞有偿家教或兼职这是一个事关劳动者义务和权利的问题，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界定，只能从职业素质和教师道德层面来加以约束，它是一个由教育体制引发的综合性社会问题，板子不能只打在教师一个人身上。

对于目前存在的有偿家教现象，仅靠地方性的一纸禁令治标不治本，既不合乎市场经济社会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教育竞争的事实。但在对待有偿家教的态度上我们也要防止过于开放，以免有些教师乱立名目搞外快，影响教学质量败坏教育风气。所以我们在整肃师风师德的同时，更要反思应试教育体制以及它所带来的公众浮躁心理，究竟如何去纠正和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

—————摘自《海南日报》

仅仅“守住底线”是不够的

《瞭望》新闻周刊第43期刊登林蔚的文章说，最近，有位领导的一番话，特别令人有种很复杂的感觉。

这位领导说：“作为领导干部，……决不能干违纪违法的事情。这是一个底线，一个做人的底线、从政的底线、为官的底线……”

这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党员干部的告诫很由衷很动情。但同时又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几分质疑。“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最低标准，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突破、突破了就将万劫不复的生命线！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仅仅守住了“不干违法违纪的事情”这个底线就够了吗？如果连守住这样一个底线都成了问题，都要被当作一个“做人从政为官”的标准郑重其事地提出来，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何在？如何“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对普遍接受过“先进性教育”的党员干部，不论其在与各种诱惑的搏斗中如何地痛苦，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把“守住底线”当作标准和要求。《孙子兵法》有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就是说，有“上”的追求，仅能得到“中”的结果，如果我们“求其下”——把守住底线这样的低标准当作标准，那结果将“必败”无疑。

个人守不住底线，最终“败”为阶下囚是咎由自取，不足为惜。但如果作为执政者只求守住底线，恐怕某一天真有全“线”失守之危险。唯愿这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常怀忧党之心，时刻保持高度警醒总不会错。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

警醒于公款吃喝吃出贪污罪

长久以来，公款吃喝这个事，讨人嫌归讨人嫌，却一直属法律管辖以外的灰色地带。不过，今后便宜饭怕是没那么容易吃了，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这么个案例：岱山县高亭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傅平洪因贪污罪、受贿罪，两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没收财产人民币 5 万元。他公款吃喝的 44 万元，全额被认定为“贪污款”。

此案一出，叫好声一片。对公款吃喝这一现象，老百姓早就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什么吃喝之风屡禁不止？恐怕是因为大多数的措施规定，仍把遏制公款吃喝，寄望于官员们的道德自律。对吃喝造成的奢侈浪费，即便审计出问题，也只能对单位不对人，无法对具体个人追究责任。在一些官员看来，公款吃喝不同于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之类的官场腐败行为，性质没有那样恶劣，危害没有那样深重，充其量是一种不正之风。

如今，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把公款吃喝认定为“贪污”，与“监守自盗罪”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在笔者看来也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公款作为来自纳税人的款项，其花销处置本就需

要担负法律上的责任，对于滥用公款吃喝玩乐的行为，造成公共财政损失的，判以“贪污”、“滥用”公款的罪名并不为过。

当然，在为将公款吃喝入罪叫好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还需建立健全一套严格的公务接待财务标准和审批、核准、监督制度。如果不能把公款吃喝的费用“透明化”，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那么无论增设什么罪名新立什么规定，都是无法治本的。

——摘自《解放日报》

政府采购“只买贵的”

在广东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一项空调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中，报价1707万元的广州格力空调公司却出人意料地败给了报价2151万元的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理由是因文字错误，为此广州格力将广州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

我们弄不明白空调采购跟“石油化工建设”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知道的是，这是政府采购，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少花钱、买好货”是必须的。政府如果紧盯投标形式的瑕疵不放，并以此影响采购的结果，舍弃性价比最好的报价，则是明显的因小失大。再退一步讲，即使格力的标书确实不合格，不予采用，那么，当时投标的企业多达五家，报价在格力之上在广东省石油化工建设集团公司之下的也有三家，按正常逻辑，番禺中心医院在放弃格力之后，应该优先选择考虑次低的报价，为何对这三家较低的报价都不予考虑，偏偏要买最贵的，难道这三家企业的标书也都统统存在“文字错误”？

政府采购是一块大蛋糕，正是因为这块蛋糕的诱惑巨大，因此，企业在分享这块蛋糕、政府在切这块蛋糕过程中很容易生成灰色利益链条，滋生采购腐败。这一次，广州市财政局还真的要好好解释清楚不可。

——摘自《扬子晚报》

城市规划“朝规夕改”损害政府信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变脸”的现象经常在一些城市规划的现实中上演。宏伟建筑刚建好不久，就面临被拆迁的命运；大型广场刚铺设完毕，又传来要被改建的声音……专家指出，

规划浪费现象令人痛心，不仅直接造成了建筑寿命的缩短、巨额资金的损失以及由兴师动众引发的纷纷扰扰，而且也给政府信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随着经济增长提速，我们确实有加快城市改造和建设的迫切心情，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不能忽视由于规划不科学、不严谨，甚至随意、人为想象造成的规划浪费。这些城市规划中的严重失误岂能用一句“交学费”就轻松带过？毕竟交这笔“学费”的，不是规划决策者，而是全体市民。

在城市规划出台前，首先需要明确究竟谁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主人不仅是市长、规划师，更应该是天天工作生活于其中的普通市民。出台一个规划之前，必须充分考虑老百姓的意见，先将其公之于众，提前听听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找出规划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从发展理念上树立“规划是全体市民的事”的观念。

此外，在我国一些地方，城市规划往往不具权威性，甚至会随着官员的任免、调动而“朝规夕改”。因此，搞好城市规划还必须要有过硬的监督和管理措施，以保证规划不被权力和特殊利益集团扭曲。

如何保障广大群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如何有效遏制官员乱插手、房产商暗地操纵城市规划的现象，这是我国城市规划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摘自《半月谈》

官员不能这样“爱”文化

日前，《中国文化报》刊登一篇罗云川的文章说：前段时间，朋友到某市参加一大型活动。活动闭幕晚会前的下午，有关人士拿着闭幕晚会演出节目单请某领导“看一下”。孰料这一看，平地风波起。该领导兴致勃发，大笔一挥，亲自对节目单“动手术”，增删修改，增加了节目单上原本没有而他自己很喜欢的几首歌曲。有关人士面有难色，说这几首歌曲乐队和演员都没合练过，晚会演出前没有合练的时间了；没有这几首歌的乐谱；节目单已经印好，重印可能来不及了……该领导急了！当晚，该领导“钦点”的歌曲如愿上演。幸好乐队指挥见多识广，临机应变，那几首歌的乐谱也大致记得，指挥乐队安全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没出什么纰漏。

无独有偶。笔者近日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在某市举办的一文化活动的开幕式演唱会上，一个个节目依次上演，演员使出浑身解数奉献精彩，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几个节目过去，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书记亲自登台，和一名女演员来了一段对唱。可以看出，书记大人是有功底的，

身手不凡，唱得确实不错，虽非专业出身，但也可算业余中的佼佼者。可是笔者一看，节目单上没有这一项啊。敢情人家是低调做人，不事张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不声不响地加塞儿，露了一小脸儿。

这两件事，让笔者感触颇深。你可能会说，不就是地方领导点了几首歌吗，不就是地方领导上场演出了一把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说明领导有文化、爱文化、重视文化嘛。而领导重视，难道不是文化发展的“福音”吗？笔者以为，未必。地方领导爱好文艺或者有文艺特长，说明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官员喜欢文化、参与文化活动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参与的方式方法。可以说，“点歌”的领导在某种程度上干涉了文化，干扰了正常的文艺演出秩序。对于该领导这一做法，相关的文化工作者也只能无可奈何。为什么哩？谁敢违背“父母官”的意志啊？谁敢得罪领导啊？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拨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工作者的职位迁升以至于养家糊口的“饭碗”，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呀。幸好，地方领导只是偶尔“兴致勃发”，点几首歌，或者“亲自”登台表演，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即便如此，还是希望此类“偶发事件”越少越好。毕竟，对于官员来说，完全没必要“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去做一名小小的晚会导演或卡拉OK歌手。

——摘自《中国文化报》

全运会“发飙”是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人素质低！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刚闭幕的全运会似乎又在给中国人素质低的说法提供佐证，全运会几乎成了发飙会：

有柔道亚军拒绝最后的称重，怒踢广告牌并狂骂：“太黑了！”；有在记者会公开发飙：“我拿的是银牌，但是我觉得我才是冠军。”；有双方观众群殴的；有狂奔150米追打主裁判的；有在赛后继续在场上站立八分钟拒绝退场的……这为我们审视发飙和国人素质的关系找到了一个观察口。所谓的“中国人素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每次全运会这么多发飙的，而奥运会上却极少？原因很简单——公正！奥运会是在公正的环境下竞争，即使输了，也心服口服。反观全运会，当各式各样的“内定”、“黑哨”、“黑腿”充斥着赛场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被暗算的选手心平气和地向对手表示祝贺？

所谓的国人素质问题也一样，同是中国人，我在特区香港极少见到有人争执发飙，因为那里

健全公正的制度设计几乎不给你什么发飙的机会，在你遇到不公待遇的时候，你很容易可以诉诸正常的制度来讨回公道。如果遇到警察野蛮执法，你不用发飙，投诉会帮你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如果遇到有人欠债不还，也不用提刀上门讨债，法庭会帮你拿回每一分钱。回到内地之后，我却经常忍不住要发飙，各种各样的霸王条款，无人制衡的专横，不发飙那叫没正义感。

发飙其实很可怜，因为它是弱者最绝望的反抗。更可怕的是，这些由基础制度设计不合理生出来的怨恨会在社会各个环节传导，你对我发飙，我对她发飙，不断找下一个出气筒。以至于大家都变得凶恶，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委屈。这与中国人的素质无关，只和公正有关。

——摘自《腾讯网》

神州扫描

广州首次网上“晒”政府预算

专家建议全国推广

114个政府部门到底是如何花钱的？这些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秘密”的内容日前得到了公开。记者在广州市财政局网站看到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114个部门预算均供免费下载，这是广州市首次在网上公开年度“账本”。

记者打开其中的“社保局”预算，内容包括了“部门基本情况”、“预算收支基本情况”、“收支预算总表”以及更加详尽的“收入预算总表”和“支出预算总表”。其中在支出预算中，细致如“岗位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的支出项目都作了公开。

对于广州的这一举措，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税研究室副主任杨志勇表示，主动公开部门预算能让监督者有了依据，对于政府部门自身来说也是好事，因为你不公开还会引来更多的猜度。广州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

——摘自《广州日报》

天津官员树新风

“五加二，白加黑”，此口号成为近年来天津干部精神状态和作风转变的真实写照。

晚上9点多，记者来到天津市规划局采访，3楼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研究天津泰安道地区规划设计方案。会议从下午开始一直没有散。连续几天的采访中，像这样“8

小时以外”的采访远不止这一次。

到基层去了解问题，到一线去推动工作，成为天津干部作风转变的一个关键。各级领导干部白天忙着下基层、跑项目、解难题，很多会在晚上开，一些干部戏称为“夜总会”。

干部作风的转变，带来了民心民气的凝聚。从天津市实行的两个大干 150 天整治市容环境，到 3 个 20 项民心工程；从 18 项措施增加老百姓收入，到构筑一道住房保障网；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到扩大就业、调整职工福利待遇、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力度；从八大公园整修一新后免费开放，到农民搬进设施完善的示范小城镇……一项项民心工程，让百姓真切感受到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而自觉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来。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网坛一瞥

杭州，“天堂”重返自行车时代

免费租用自行车，市民欢迎

始于 2008 年“劳动节”的这项尝试，最初只是一个应急的新试验。

当时西湖边有很多个体自行车租赁，经常有游客投诉服务质量差，杭州市政府遂希望借“统一”实现规范管理。于是，在杭州市政府的主导下，一个国有独资的“公共自行车公司”成立了。

最初的步伐是试探性的。总经理章福民回忆，2008 年 5 月 1 日试运行时，只设置了 61 个自行车租赁点、2800 辆自行车。而且繁琐的租赁手续和高发的故障率，使“租用成功率不到 50%”。

此后，公共自行车公司迅速升级了租车系统。比如，之前租车，需要在租赁点的 POS 机上刷卡交纳押金。而升级后 POS 机内置在自行车架上，无论还车取车，都只要在车架上刷卡。

另外，针对市民投诉，自行车公司延长了服务时间，甚至投放了带小孩座椅的自行车。细节的完善刺激了人们的兴趣，到 2009 年国庆前，租赁点已扩充到 1600 个，单日使用人次已突破 15 万。

免费租用或是公共自行车广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只要使用在一小时内，无需付费，“有时快到时了，使用者会到就近的服务点先还车，再租车。”

更意外的收获是，“运行近一年来很少发生偷盗现象，人为的微小损害比例为千分之五。”章福民说。这或得益于一开始就设置的先进防盗设施和视频监控。比如设计人员将自行车的颜色定

为大红色和橙红色，“就是为了和普通自行车明晰分开”。

“绿色出行”前景辽阔

如今，数据统计表明，杭州公共自行车使用者，90%以上是市民或长期在杭州的外来务工者，游客不到10%。

相较于最初只是为了规范景区服务设施的初衷，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和中国太多的大城市一样，杭州在过去十年房地产和私家车双重无限制的增长后，城市交通几乎陷入寸步难行的困境。为解决交通拥堵，杭州也是靡计不施，路越建越多，越铺越复杂，从“三口五路”到“一纵三横”，到“五纵六路”，再到“两绕三纵五横”，所费以千亿计。

但这些硬件或软件上的改良，在每年以超过5万辆速度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前，犹如杯水车薪。2006年，陷入绝境的杭州一度试图调研征收“拥堵费”引来骂声一片。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成为真正救命稻草的，竟是被都市化改造抛弃多年的有碍观瞻的自行车。

高架桥上考虑建自行车专用道

此前，为改善城市形象，曾大规模地淘汰人力三轮、摩托车等“四小车”。而每一次的道路翻新，“增加的都是机动车道，为机动车让路的自行车一度被挤到了人行道上”。

但现在，在建成后基本没有非机动车道的“两绕三纵五横”路上，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要求重新考虑自行车的通行问题——“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可以两者兼有，实在不行，必须保证有自行车道。”王还提出，甚至高架桥上，也考虑建自行车专用道，“否则，公共自行车骑过江很麻烦。”

公共自行车在缓解城市交通的现实需要之后，绿色出行的深意也被发掘。公共自行车出行在杭州公共交通总量中的份额已接近4%，其节能减排的作用不容小觑。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17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bk@126.com